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ERIES

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

伊拉克战争解析

孙吉胜 著

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

伊拉克战争解析

孙吉胜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伊拉克战争解析 / 孙吉胜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ISBN 978 - 7 - 208 - 08293 - 9

I . 语… II . 孙… III . ①语言-影响-国际政治-研究
②伊拉克战争(2003)-研究 IV . H0 - 05 D81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9434 号

责任编辑 任俊萍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
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
——伊拉克战争解析
孙吉胜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1 插页 4 字数 276,000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8293 - 9/D · 1500
定价 36.00 元

丛书总序

走向世纪之交的国际社会,以其前所未有的成就,期盼着、静候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

人类从未有过如此辉煌的业绩,也从未面临过如此艰难的选择。

当下之时,人们刚刚庆幸于和平地实现了国际格局的大转换,却又忧心忡忡于帝国崩溃之后的动荡与纷乱;旧有观念系统被冲击后的迷惘与困惑,以及未被摧毁的武力所带来的疑虑与恐惧。人们在欢呼史无前例的繁荣进步之余,还不得不为已经显露、或尚被隐匿的种种不测之虞所困扰:国际交往迅速增加之后所伴生的失控;政治经济体制变迁的同时引发的失却平衡;科技昌盛之后所出现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破坏;尤其是新一轮大国竞争所酝酿的国际社会的重大变化。凡此种种,无不对这个因循沿袭和重新构建中的国际政治秩序提出巨大的挑战。

恰恰是这种变动与期盼、困境与挑战,渴望着一门能够对当前国际变化指点迷津的成熟的知识门类应运而生。在这种背景之下,作为专门研究国家间交往规则与方式、国际结构要素与机制及其变化规律与逻辑的国际政治学科,不仅无由推却自己的历史责任,而且必须以自身所持有的知识工具,为新世纪的降临催产。

传统的国际政治学科曾有丰厚的积累。这一知识领域对世界体系、国家主权、民族观念、冲突合作、地缘政治,以及交往机制与结构性问题有着诸多理论思考与详尽的实证记载。问题在于,当今的国际变迁已经大大超出这一传统知识门类所能容纳的范围。

当今,人们已远远不满足于对国际事务简单的、或者哪怕是详尽的记录式描述,而往往要求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从描述方式向理论分析方式的转化,已经是客观的国际现实的耳提面命。人们也往往不满足于仅仅或从政治,或从经济,或从军事的单一学科的国际现象分析,国际事务本身早已经跨出了学科的阈域。所以,从单一学科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心理、历史乃至包括各门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已经是学科本身的逻辑发展所使然。恐怕,一个更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人们还往往不满足于从国际政治与国内问题相互隔裂的眼光来看问题,一个高度一体化的世界,已经把各国内外的变迁与国际交往与世界性事务紧密相连。因此,从国际与国内相互关联的角度来审视当今世界发展的水平,潮流的变迁,甚至于世风的转换,无论对于学科建设,还是对于战略选择与政策判断来说,都是一个格外重要,也格外需要重视的方面。

在海外,面对新世纪的国际政治学者们已经向世人交出了他们的答卷。近年来,蜚声欧美的保罗·肯尼迪、布热津斯基、塞缪尔·亨廷顿,包括基辛格等,已经写出了多部长篇巨著,直面国际巨变,预言天下走势。虽然,这样的一类著述不会也不可能给出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但是,国外同行世纪末的冲刺,无论如何给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信号: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界将如何回答既是来自客观研究对象的、也是来自同行同代人的挑战?

所幸者,国际问题学术研究领域已经不大可能再是欧美国家的一言堂了。生存与发展、一体化的挑战以及出于对全人类命运的共同关切,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学者,一步一个脚印地营建着自身独特的国际政治知识结构。

当然,要达到这一目标远不容易。中国国际问题学者首当其冲的任务,恐怕是要寻找和形成国际政治专门领域的研究语言与研究规模,并克服模棱两可、大而化之表述的障碍。因为主观臆测、缺乏实证基础的做法,曾经给我们的国际研究与重大问题的判断带来干扰与破坏。

与此同时，构筑国际政治领域独特的概念与范畴体系，也是需学者们皓首穷经，冥思苦寻方能实现的境界。对于一个思辨逻辑传统相对薄弱的民族，这无异是一场脱胎换骨的观念革命。事情恰恰在于，一个没有独特范畴与概念体系的专业门类，就没有权利去担当反映和影响国际政治现实的“理论”角色。

从客观上说，与工业发达国家早期现代化阶段的国际环境相比，当初，西方列强是在一个积贫积弱的环境中以坚船利炮和先进的科技文明开拓新边疆的；而今，当发展中国家起而奋进时，举目四望，国际环境中却早已是强手林立。这样的国际环境反差，也决定了两种国情与国际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研究将会在研究的主题、方法、素材等许多方面大相径庭。这也是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必得对当今国际问题作出自己回答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所在。

出于上述考虑，本丛书立意于回应国际社会走向新世纪进程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并出于构建中国背景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的长远考虑，延请国内一流的国际政治学者，采用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国际政治学术著作，以飨海内外的同行与读者。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编委会

1995.5

目 录

丛书总序	1
导论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语言研究	1
第一节 语言与国际关系	1
第二节 国际关系理论的语言研究	5
第三节 本书的主要内容	16
第一章 语言、意义与国际关系理论的语言转向	22
第一节 语言、意义与政治	22
第二节 语言哲学与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	32
第二章 言语与规则建构	45
第一节 言语与规则建构的理论基础	45
第二节 言语、规则与国际关系	52
第三章 语言游戏与游戏建构	64
第一节 语言游戏与博弈游戏	64
第二节 国际关系中的语言游戏建构	70
第四章 语言表象力与社会语言建构	80
第一节 表象力与身份	81
第二节 表象力与实践	91
第五章 话语、身份与政策建构	105

第一节 话语与意义	105
第二节 话语、身份与对外政策	110
第六章 语言建构的分析模式	128
第一节 国际政治中的语言	128
第二节 语篇层次	135
第三节 词汇层次	143
第四节 句子层次	147
第七章 伊拉克战争的语境基础	154
第一节 伊拉克战争的意义基础	154
第二节 “9·11”事件后的布什话语	162
第八章 伊拉克战争的语言建构分析(一)	168
第一节 发动伊拉克战争前的美国	168
第二节 本阶段语言分析	178
第九章 伊拉克战争的语言建构分析(二)	212
第一节 交战中的美国和伊拉克	212
第二节 本阶段语言分析	223
第十章 伊拉克战争的语言建构分析(三)	250
第一节 困境中的伊拉克战争	250
第二节 本阶段语言分析	258
结语	294
附录	299
参考文献	303
索引	314
后记	324

导 论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语言研究

第一节 语言与国际关系

社会研究是社会科学发展和提炼理论的一种尝试,这些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世界上经常会发生一些事情令人困惑。如果我们要理解为什么有些事会发生或是希望控制某些事件的出现,就必须简化对现实生活的感知,找到其中的规律。¹

一、语言与伊拉克战争

我们进行研究经常是始于问题。本书涉及的研究主要始于对当前伊拉克战争的一些疑惑。2003年3月19日,美国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向伊拉克发动了“伊拉克自由行动”(Operation Iraqi Freedom),开始了伊拉克战争。这场战争延续至今历时5年,对中东和整个世界局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布什政府发动战争主要是基于三个理由,即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违背了联合国的规定,生产和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和基地组织有密切联系²,萨达姆政权长期压迫伊拉克人民,美国必须解放受压迫的伊拉克人民³。从布什政府对战争的宣传动员看,应该说战前的宣传相当成功。在战争爆发前,美国公众对战争的支持率高达70%以上⁴,79%的民主党人认为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持此观点的共和党人则高达95%;大约一半人认为萨达姆和

“9·11”事件有关。⁵但是随着战争的继续,美军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加。截止到2008年3月24日,在伊拉克阵亡的美国士兵达到4 000人⁶,另有近6万人受伤,落下终身残疾。⁷截至2008年3月,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的花费也高达6 000亿美元,到2009年可能达到2万亿美元⁸,伊拉克战争也随之成为美国外交史上耗资最多的战争之一。⁹布什总统也不得不承认,伊拉克战争在人力和物力方面代价相当高昂。¹⁰但是,尽管战争已经历了五个年头,美国在伊拉克并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有找到萨达姆与“9·11”事件有直接联系的证据,伊拉克对美国的威胁并不像战前美国政府所描述的那样迫在眉睫,人们越来越质疑这场战争的必要性。美国政府后来解释这些是由于情报部门的错误所致。虽然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但是伊拉克的安全形势每况愈下,伊拉克人民每天要面对爆炸、袭击,他们根本没有得到美国政府所承诺的自由、民主和繁荣,却需要时刻担心自己的安全和生存,而其他问题都随着战争的继续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这种局势何时结束还是一个问号。据统计,5年里总共有近9万名伊拉克人死于战乱。¹¹据联合国难民署和伊拉克红新月会最新统计,战后共有400多万伊拉克人沦为难民,其中200万是国内难民。¹²美国公众对战争的支持率也不断下降,在2007年国情咨文发表之前,布什的支持率仅为33%,是他2001年就任总统以来的最低点;认为布什在国家面临危机时是值得信任的人数比例也降到42%,也是他就任总统以来的最低点。¹³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在伊拉克战争四周年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伊拉克战争开始时,68%的美国民众认为伊拉克的局势值得美国战争介入,而四年后多达61%的人认为,美国不值得发动伊拉克战争,有近七成的人认为,伊拉克的战事对美国十分不利,美国“不大可能”打赢这场战争。美国民众对伊战的支持率一直呈下降趋势:2004年时约为56%,2006年时降至约37%,到2007年3月只有35%。¹⁴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和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共同撰文,指出伊拉克战争毫无必要,美国实际是夸大了伊拉克的能力和对美国

的威胁。¹⁵两位学者通过回顾历史指出,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萨达姆过去的言行看,美国对萨达姆采取一种警惕的遏制政策就足够了,美国的威慑政策在过去对萨达姆一直起作用,将来也会同样如此。如果美国不直接威胁伊拉克的存亡问题,萨达姆不可能对美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¹⁶即使萨达姆拥有了核武器,美国也同样可以遏制他,美国所担心的萨达姆可能把核武器转给或卖给恐怖分子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¹⁷布什政府实际是错误地建构了萨达姆的身份而发动了“毫无必要的”战争。¹⁸虽然布什政府认为伊拉克战争是全球反恐战争,但是正如美国语言学家桑德拉·希尔伯斯坦(Sandra Silberstein)所指出的,恐怖主义只是一种犯罪行为,不必要以战争的形式来对其做出反应。¹⁹那么,美国政府是如何把伊拉克建构为美国所面对的突出问题,使之安全化(securitization),如何建构出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理由使之为公众所接受,并在高支持率下对伊动武?加里·雅各布森(Gary C. Jacobson)指出,伊拉克战争是建立在言辞,而不是证据之上。²⁰那么,布什政府在整个过程中是如何建构了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紧迫性和合法性?当发动战争的理由得不到证实时,美国政府又是如何来阐述战争的必要性?自始至终,语言在这个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如果这样,行为体主要是通过何种途径来实现自己的建构意图?语言在整个过程中又是如何变化的呢?我们如何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看伊拉克战争?

二、语言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性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来看,学者们对语言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语言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显示出来。首先,语言对认识国际关系具有本体和认识论意义。在国际关系理论界,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对语言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的研究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主要是由语言本身的特征和国际关系学科的特点所决定的。国际关系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而语言是社会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不同形式的言语行为来表述世界。

语言在国际关系中具有本体意义。约翰·塞尔(John R. Searle)指出,任何制度性事实(institutional facts)都是以语言为前提,语言是建构制度性事实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些制度性事实,语言可以存在;反之,却行不通。²¹由此可见,在一个社会中,很多思想和很多事实必须通过语言来完成,很多制度必须通过语言才能建立。所以,我们必须关注国际关系中语言的本体作用。从认识论角度看,语言是我们认识世界所必不可少的,我们必须通过语言才能把复杂的社会世界表述出来,使之条理化、有序化。²²不同的言语行为会不断地在世界上建构出更多新的制度性事实。很多关注语言的基础建构主义者,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都强调个人之间的语言交流是发展任何一个建构理论的重要因素,建构主义研究必须把个人带回到研究视野中来。²³我们不应该再把行为体当作一个“黑箱”来看待,而对行为体的语言的研究正是探索这个“黑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语言具有建构功能。语言具有象征力(symbolic power),能够创造意义。语言的象征力可以使语言通过以言取效(perlocutionary act)模式来更好地表象事实,更好地体现行为体的意图,如通过语言的形式结构和内容结构,即句法和语义来完成。另外,语言本身很多时候会产生规范,能够产生权利和义务,更好地调整人们彼此的权利、责任、义务、特权、惩罚、许可关系等。²⁴语言还可以建构荣誉或是诋毁荣誉。²⁵如在布什的演讲中,关于萨达姆和伊拉克的反面描述以及关于美国的正面描述,对建构伊拉克的反面形象和美国的正义形象起了重要作用。因此,语言应该是我们研究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在这种语言观的指导下,目前语言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研究正在日渐深入、具体。

尽管如此,国际关系理论界各大流派对语言的关注和研究程度明显不同。现实主义对语言的研究不是很重视,认为人们只是用语言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如欺骗、动员等,他们并不重视语言对行为体行为的

限制作用。自由主义尽管关注的重心是制度,但是制度的形成必须是以语言为媒介,制度性事实离开了语言也就不复存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对语言的真正关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语言进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议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²⁶时至今日,相关的研究已经越来越细化。这些研究总体认为语言在国际关系中不仅仅是工具,还具有本体和认识论意义,即语言在国际政治中具有本体作用,国际关系中的一些事实是由语言建构而来。其认识论意义则在于人们通过对语言的研究和认识来理解国家的对外政策和世界政治的进程。

另一方面,国际关系中的一切活动必须通过语言才能完成。在目前的国际关系中,各国间的交往和相互依存程度正日益加深。近年来,不难看出国际关系中国家间各种层次的对话不断增多,国家间不同层次的交往日益密切,所有这些都离不开语言。所以,语言作为交流、沟通的媒介和文化的载体需要学界对其给予应有的关注。政治行为体必须意识到语言的作用,语言不仅起到表象、标签的作用,还有建构作用:语言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建构规则、建构语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人们的思维方式,约束人们的行为。语言运用得好会为行为体的政治行为提供助力。所以,研究语言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不仅可以理解国际关系中的诸多现象和困惑,对外交决策者也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书由此把国际关系中的语言作为理论核心,提出一种国际政治中针对语言的分析模式,看行为体通过何种方式来运用语言建构世界,实现自己的交流意图。通过对布什总统关于伊拉克战争的语言的具体分析,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国际政治中语言的理解。

第二节 国际关系理论的语言研究

我们进行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研究是通过针对问题的研究来发现

其中的规律,使我们在该领域的知识能够得到不断积累和更新。就具体的研究过程而言,问题的提出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变量关系提供了基础。²⁷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再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梳理。任何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通过梳理所提出问题的相关研究现状,我们可以避免重复研究,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发现以往研究尚未解决的问题。²⁸在此基础上,才可以使新的研究更加全面深入。

一、语言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

语言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前基本不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议程内。80 年代末出现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后,从语言角度进行的研究才开始迅速发展。我们在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提出语言建构的分析模式,以进一步指导国际关系中针对语言的研究。

1. 语言与国家关系理论发展

西方国际政治学属于“20 世纪的新兴学科”,非常年轻。²⁹从 1919 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关系讲席至今也不过近 90 年。³⁰而国际关系理论作为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在近 90 年内经历了自己的发展和演进,不断成熟、深入。从 20 世纪 40 年代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思想之争、60 年代科学主义对历史主义的挑战、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新—新之争”,直到 90 年代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三足鼎立,国际关系理论涉及的内容越来越广泛,理论的探索也越来越深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关系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展示了很强的开放性,出现过多次向其他学科的借鉴和融合,使国际关系理论本身有了长足的发展,我们对世界政治的理解也更加全面。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整体发展来看,学者们对语言的关注从无到有。从整个学科的流派特点来看,学界基本达成共识:现实主义强调权力,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制度,而建构主义则把焦点置于文化、规范和认

同,从本体角度更加强调社会范畴的内容。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结构建构主义在学界是影响最大的一个社会建构主义流派。温特主要是采用了一种社会理论的视角,采纳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一些概念。其理论认为身份至关重要:我们对自己和所处环境的看法塑造了彼此间的互动,同时也被这种互动塑造,通过这种方式造就社会现实。³¹因此,国家利益不是外生事物,而是内生的。国家安全是一种主体间事物。但是温特在关注国际关系社会性的同时,并没有把社会性的重要内容——语言——纳入自己的研究日程,而是对语言采取了忽略态度,这样可以使他的理论能够和当时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更好地对话。另一方面,这也为以后的学者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如当前在国际关系理论语言研究领域比较有影响的几位学者中,莱纳·汉森(Lene Hansen)和贾尼丝·比埃利·马特恩(Janice Bially Mattern)都曾在耶鲁大学接受过温特的指导,在她们的研究中语言被提到了核心位置。她们所提出的关于语言的相关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的语言研究中也极具代表性。

国际关系理论语言转向后,相关的语言研究迅速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随着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诞生而开始,对后来的社会人文学科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国际关系由于长期以来受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的影响,对语言的关注相对比较迟缓,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得以改变。国际关系理论对语言的研究主要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以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为主。建构主义主要是受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哈贝马斯、维特根斯坦等人思想的影响,强调语言对社会建构的本体作用:语言能够建构一定的社会现实,如语言建构规则、规范、身份等。后结构主义深受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尤利娅·克利斯蒂娃(Julia Kristeva)等人的影响,不承认绝对真理,强调解构,而不是对实证主义政治的重新建构。³²其中心任务是解构现存范畴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后结构主义更加强调

语言的本体作用,更加关注对文本的内容和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的研究。

从语言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来看,该领域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努力。第一阶段主要是1989年开始的语言转向初期,以尼古拉斯·奥努弗(Nicholas G. Onuf)、弗雷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Friedrich V. Kratochwil)、詹姆斯·德里安(James D. Derian)等人为代表。从语言角度来进行安全研究的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奥利·维夫(Ole Waever)的社会建构思想也是形成于该时期。³³在他们之后,国际关系学界开始涌现出更多属于语言建构范畴的研究,如以奥努弗为首的“迈阿密国际关系研究小组”(Miam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roup)从1998年开始出版名为《建构世界中的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的研究丛书系列,不但对语言转向后的建构主义理论本身进行了发展和完善,还把一些相关理论应用到国际关系中的具体案例研究,使该领域的研究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出现了继1989年后的另一个高潮。菲尔克(K. M. Fierke)、加万·达菲(Gavan Duffy)、珍妮弗·米利肯(Jeniffer Milliken)等继续在该领域探索。此后,在最近两三年内的第三阶段,马特恩和汉森等从语言的表象力(representational force)和话语(discourse)等角度对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研究。具体而言,以上学者对语言研究的切入点主要可以分为四类:一种是从言语行为角度,主要是以奥努弗和“迈阿密国际关系研究小组”为代表;一种是从语言游戏角度(language game),主要以菲尔克和达菲等为代表;一种是从语言表象力角度,主要是以马特恩为代表;一种是从语篇和话语的角度,主要以米利肯和汉森等为代表。这些学者的主要观点涉及了语言研究的多个方面,各有侧重,体现了各自在语言建构领域的独创之处。

国内学者对国际关系中的语言研究并不是很多,所涉及的研究评论居多,相对滞后于国外的学者。相关研究主要涉及社会建构主义中语言的作用,³⁴认为语言的作用问题是社会建构主义内部不同流派间

的主要区别所在，国际关系学界应该对语言的作用给予特别的关注，而这也正是批评建构主义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³⁵一些学者还对奥努弗、克拉托赫维尔、哈贝马斯等人进行了具体研究，具体内容包括语言如何演绎出规则和规范，如何形成统治，语言如何用于社会交流行动（communicative action）等。³⁶对建构主义中的语言游戏的研究主要强调语言造就游戏规则，规则塑造语境（context），语境决定意义，进而决定人的思维和行为。³⁷也有学者研究话语和观念的关系，重点强调话语的社会性，而不仅仅只是观念对话语的作用。话语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话语要求社会共享，共享的基础是协商，话语作用于观念，观念反过来制约话语。如此的双向交流、循环往复、不断生成的过程促使新的观念和新的话语不断生成以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³⁸此外，理解与话语也是近期学者们研究的一个方面，主要认为国际关系中的人和事件的意义是通过语言而赋予意义，这些意义同时又建构和影响国际关系的“现实”，所以我们要关注国际关系中的话语霸权现象，关注对国际关系“事实”的理解。³⁹

国内的少数学者也根据语言建构的相关理论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刘永涛在《伊拉克“战争动员”：对美国总统话语的一种分析》⁴⁰中指出，在国际关系中语言至关重要，会对政治进程及其结果构成影响。布什把政治语言作为对伊拉克政策的一项战略工具，通过把萨达姆政权叙述为一个迫在眉睫的“敌人”，将他“邪恶化”和“罪孽化”，使美国政府在采取“更迭”一个主权国家政权的行动方面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潘亚玲在《“9·11”后布什政府对“敌人”的建构》⁴¹中指出，“9·11”事件后美国对敌人的建构包括两个方面，即对敌人的抽象化与非人化，以及对自身国家的拟人化。文章考察了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对其“敌人”的建构，认为其努力既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之处。它成功地塑造了敌人“邪恶”和自身“善”的形象。但是，由于恐怖主义的性质，美国又不得不将敌人具体化、扩大化，从而导致了美国在“9·11”事件后建构“敌人”的长期失败。